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文贯中 刘愿*

摘要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 公共食堂,退出权,饥荒

“大跃进”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其成因逐渐得到较深入的研究,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和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饥荒的三大主要成因。¹《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以下简称《退堂权》)一文从农民自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对饥荒的爆发、加重和结束的影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在大饥荒成因中的关键性作用。《退堂权》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之余,如果农民口粮得到有效消费,而不是强制性地集体化,大饥荒是否可避免?该文指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做法,彻底破坏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机制,使在口粮紧缺情况下传统的公共及家庭层面的赈灾机制失效,从而导致一系列后果,包括粮食首先遭到过度消费,进而遭到干部的贪污和侵蚀,食堂本身的低效和它所代表的基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理念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农民丧失任何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这也揭示了为何“大跃进”饥荒竟然绵延三年,直至农民被允许退出食堂,饥荒才在农民人均粮食消费跌至最低点的时候竟又迅速停止。因此,《退堂权》一文在肯定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及其解散是“大跃进”饥荒触发和结束的最重要的成因。

*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刘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刘愿,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39310072;E-mail:hope428@163.com。

¹ 关于“大跃进”饥荒时期中国农村的粮食分配机制,参见刘愿《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一文图1的描述。

杨涛和范子英对《退堂权》一文提出了若干评论意见。杨涛认为,集权体制、计划严重失误与政治行为三因素相互作用,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下降,继而导致饥谨荐臻的最主要原因。作为一般的原则,杨涛提出的这些导致饥荒的因素自然是有道理的。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想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的假说虽有道理,但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饥荒,饥荒成因研究需再往前推进。所以,《退堂权》一文强调,离开强制性的食堂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笼统地讲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都无法解释如下的问题,即中国的路线在20世纪60年代后至改革开放前变得越来越“左”,领导的方式也越来越集权,中央计划的失误也因“文革”的原因而越来越严重,但大饥荒在1958—196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显然,杨涛提出的三大原因如果不进一步往前推,其解释力是不够的。

杨涛提出饥荒的爆发及结束可能存在一些公共食堂以外的因素,如1958年部分地区粮食大量外调及高强度劳动,饥荒后期合理的粮食调配帮助中国走出低谷。范子英认为1958年粮食丰收是不可信的,公共食堂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且公共食堂制度并未一贯彻底执行。他再次强调了“大跃进”饥荒的缺粮区偏向和达尔文效应。本文沿着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线索再次厘清相关问题。

一、饥荒爆发

范子英(2010)认为,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由于1958年农村在“大跃进”运动中粮食生产管理不善,即使“风调雨顺”,1958年实际粮食产量也很可能低于1957年,至少“大丰收”是不可信的。因此,以公共食堂解释饥荒爆发存在不足。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58年粮食(指原粮)产量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6%。²那么,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呢?

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回忆道,1958年2月3日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3920亿斤,并认为“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在年景正常的条件下,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³1958年成灾面积及其比重比1957年均大幅度下降,⁴农业机械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又大大减轻了抽调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⁵国家统计局

²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12页)。

³ 薄一波(1997,第687页)。

⁴ 1958年成灾面积为782万公顷,比1957年的1498万公顷,下降了48%(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0)。

⁵ 1958年全国大力推广和应用农业机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为26396混合台,比1957年增加了80%;联合收割机为3452台,比1957年增加了92%(国家统计局,1980,第251—252页)。

公布的产量数据只包括已经收获入库的粮食，排除了浪费在地里的部分。⁶因此，4000亿斤粮食产量有其合理依据。近四十年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了粮食产量数据的来源。⁷1958年8月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反映浮夸的实情，薛暮桥说：“现在‘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果然，1959年4月，周恩来就要薛暮桥到统计局核实1958年的统计数字，粮食产量从原来的7500亿斤核减到5000亿斤，后来又核减到4000亿斤。⁸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庐山会议的初衷也是纠“左”的。⁹因此，1958年粮食产量4000亿斤的数字是比较全面可靠的，根据个别的猜测无法否定1958年粮食增产这一事实。具体到四川省的情况，经过反复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2245.5万吨，比1957年增产5.4%。¹⁰因此，1958年四川省粮食增产也是可信的。

可见，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在粮食增产情况下首先在局部地区爆发的，从历史上看的确是一个特例。杨涛则指出，即使粮食增产，一些激进的地方政府把粮食大量外调，加上农民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仍可能导致该地区1958年死亡率上升。不过，如图1所示，即使考虑粮食征购、外调及库存等因素之后，农村留粮数量与人口死亡之间并没有确切的相关关系。作为1958年饥荒首先爆发的地区，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农村留粮显著增加。¹¹例如，1958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比上年增加了8.7%，死亡率比上年骤增了13.1‰；1958年甘肃省人均留粮增加7.6%，死亡率比上年增加了9.8‰。1958年云南农村人均留粮下降幅度远小于安徽但死亡率却大大高于安徽。换言之，四川、甘肃、云南三省是在农村留粮显著增加或下降不大的情况下首先爆发饥荒的。

⁶ 例如，薛暮桥1959年6月在一份材料中说道：去年（1958年）粮食的实产量估计是4600亿斤，秋收中损失约300亿斤，实收到4300亿斤，比1957年增加600亿斤（薛暮桥，1984，第90页）。可见，国家统计局在核实公布粮食产量时已排除秋收粗糙造成的浪费。

⁷ 薛暮桥（1996，第256页）。

⁸ 薛暮桥（1996，第256页）。

⁹ 杨继绳（2008，第762页）。

¹⁰ 根据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58年四川粮食产量（原粮）为495亿斤，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月提供的统计数据是492亿斤。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偏高，1962年7月对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是：1957年430亿斤，1958年470亿斤，1959年390亿斤，1960年323亿斤，1961年260亿斤（杨继绳，2008，第181、217—218页）。根据1983年四川省农牧厅公布的数据，1958年四川省粮食产量为449.1亿斤。（四川省农牧厅，1983，第48页），国家统计局一直沿用这一数据作为1958年四川省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700页）。

¹¹ 云南例外，具体见《退堂权》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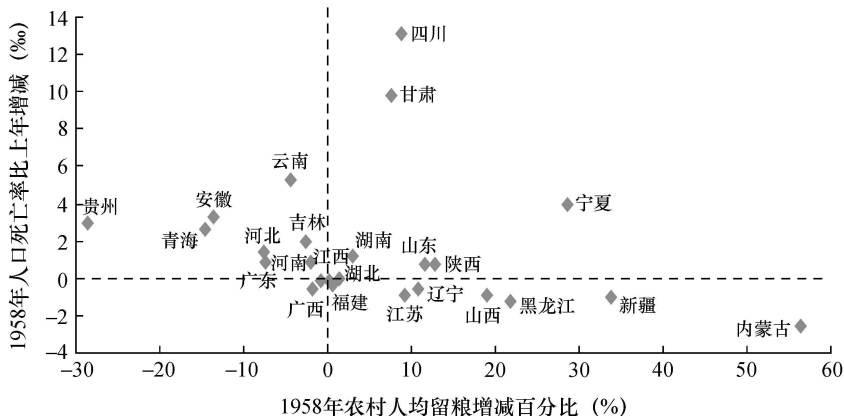


图1 1958年各地区农村人均留粮及死亡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其次，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过程中农民被迫参加各种高强度劳动可能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但这一因素不是四川、甘肃等省首先爆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如图2、图3所示，从各种指标来看，四川、甘肃、云南三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各省区中并不算激进。1958年四川新增灌溉面积分别为2212万亩（占比32%）、¹²完成土石方32亿立方，甘肃、云南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比四川省还要小。1958年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新增灌溉面积及其比重均远远超过四川省的水平：河南省新增灌溉面积8254万亩（占比65.4%）、完成土石方65.4亿立方；河北新增灌溉面积6672万亩（占比71.1%）、完成土石方70亿立方；山东新增灌溉面积6100万亩（占比67.1%）、完成土石方67.1亿立方；安徽新增灌溉面积2675万亩（占比43.9%）、完成土石方60.6亿立方。¹³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均完成土石方数，四川、云南、甘肃分别为61立方/人、94立方/人、288立方/人，不仅远低于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的水平，而且四川和云南的劳均数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¹⁴

可见，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更大的省区并不像川云甘那样首先爆发饥荒，高强度劳动并非触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农村“大跃进”运动初期，由于粮食供应比较充裕甚至在公共食堂制度下过度消费，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高消耗工程并没有立即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只是在口粮供给紧张之后，农民既要从事高强度劳动却又因干部克扣等因素而造成营养不良致死。

¹² 即新增灌溉面积占当年总灌溉面积的比重，下同。

¹³ 数据来源同图2。

¹⁴ 全国平均水平为231立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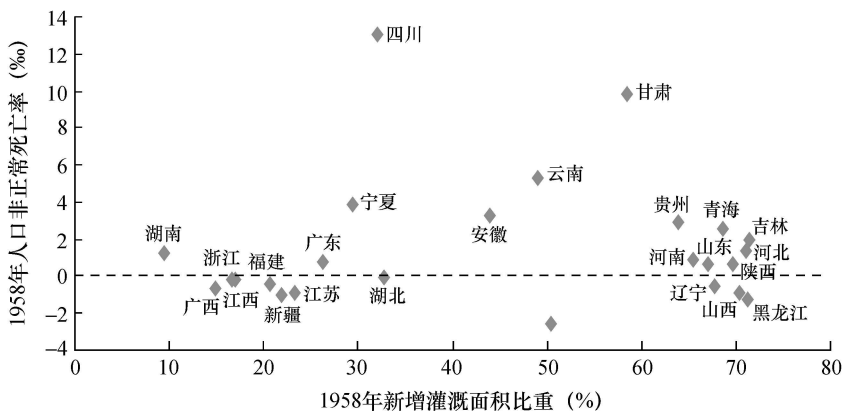


图2 1958年各地区新增灌溉面积比重与非正常死亡率

数据来源：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296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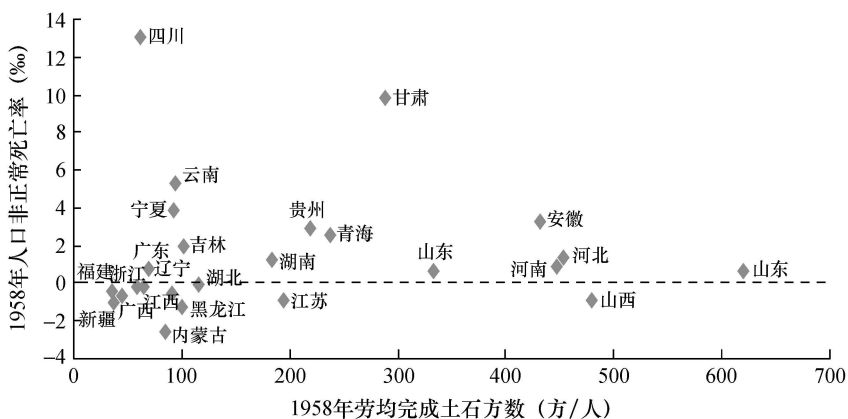


图3 1958年各地区农村劳均完成土石方数与非正常死亡率

数据来源：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32—33、296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我们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的粮食浪费是触发饥荒的重要成因。对于公共食堂制度的粮食浪费，许多研究者半信半疑。¹⁵《退堂权》一文引用的薛暮桥对1958年农民浪费粮食的数据是可信的。如表1所示，在饥荒最轻的江西省，据丰城县小港公社张家洲村1961年的调查，公共食堂通过公社加工厂对稻谷脱皮加工、生产队分粮两项即克扣掉农民口粮2.72%；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粮食共计1302.5斤，占口粮总数的2.16%；食堂保管员称米下锅、量饭、贪污饭票等项又占口粮总数的2.03%；炊事员明吃暗偷、生产队派员外出搞副业粮食补贴及请木匠、篾匠修补添置农具所需粮食和管理损耗等项又

¹⁵ 例如，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在2009年12月18日关于《退堂权》一文的宣讲会上质疑说，根据“四清”时期的数据，公共食堂时期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的程度并不如想象中严重。

占口粮总数的 0.92%。可见, 张家洲村公共食堂制度使农民口粮减少了 9.8%。江西省公共食堂制度普及率低且激进程度轻, 而且 1961 年春公共食堂制度已经比较松散, 张家洲村公共食堂 9.8% 的粮食损耗应该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薛暮桥估计 1958 年农民因公共食堂浪费粮食 350 亿斤, 相当于农村留粮的 11%, 占农民粮食消费总量的 16%,¹⁶ 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表 1 江西省张家洲村公共食堂盘剥农民口粮方式及其占农民口粮比重

江西省张家洲村公共食堂盘剥农民口粮方式	占农民口粮比重(%)
① 每 100 斤应出 73.5—74.5 斤米的稻谷, 经公社加工厂加工后, 只能得到 70 斤或 72 斤米	1.96
② 到生产队又一律只按 70 斤的标准折算给社员, 而且从加工厂得来的每 100 斤稻谷 1 斤的碎米也不下分	2.72
③ 生产队干部近 1 年来吃夜餐和到大队、公社开会吃双份粮, 以及其他一些名目的贪占, 私分大米或粮食 1302.5 斤	2.16
④ 保管员称米下锅、量饭、贪污饭票等	2.03
⑤ 炊事员明吃暗偷、生产队派员外出搞副业每人每天补助大米半斤, 请木匠、篾匠修补添置农具所需粮食和管理损耗等项	0.92
各项合计	9.79

资料来源: 龙宇文(1988), 转引自黄道霞主编(1992, 第 586 页)。

二、饥荒加剧

食堂对饥荒加剧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首先, 食堂本身的消费低效率和为干部贪污、侵蚀农民口粮大开方便之门减少了农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口粮; 其次, 食堂制度代表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丧失殆尽, 使粮食生产连年下降, 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短缺。

Kung and Lin (2003)、范子英 (2010) 均认为公共食堂制度并未得到一贯的执行, 因此其对饥荒的作用可能被夸大。对此, 《退堂权》一文指出, 公共食堂确实经历了“一哄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央批准退堂权、食堂全面解散”四个阶段。其中, 大批散伙发生在 1959 年春至庐山会议之间, 是中共中央在 1958 年“大跃进”狂潮之后、庐山会议结束之前应对春荒的纠偏措施之一。¹⁷ 然而,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罪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当时, 坚持办公共食堂成为判断农民是否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不少在 1959 年春纠偏工作中解散公共食堂的地方领导受到了批判。在毛泽东的推动下, 公共食堂又在全国上下被强令恢复。¹⁸ 尤其

¹⁶ 1958 年农村粮食占有量为 3165.5 亿斤, 农村消费量 2152 亿斤(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343、538 页)。

¹⁷ 195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提出“积极办好, 自愿参加”的方针, 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 分配到社员, 在公共食堂吃饭的, 粮食交给食堂, 节约归个人; 不在食堂吃饭的, 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黄道霞, 1992, 第 567 页)。

¹⁸ 在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在 7 月 23 日的长篇讲话中, 强调“食堂是个好东西, 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

是，庐山会议是在夏收完成、粮食上场、饥饿短暂缓解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为毛泽东强令恢复食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比例仍高达72.6%。而且，在四川、河南、安徽、云南、贵州等饥荒重灾区，公共食堂参与率均超过90%。¹⁹1958年年底全国90%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公共食堂，²⁰是农民为吃饭不要钱所吸引，在未能预料其致命弊病的情况下对这种新制度产生一时热情所致；²¹至1959年年底农民已饱受公共食堂制度的危害，仍有72.6%的农民被迫加入公共食堂。可见，庐山会议后人民公社不是放松而是加剧了公共食堂的强制性。

一旦食堂存粮告罄，难以为继，很多地方的食堂确实名存实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堂的危害就解除了。如《退堂权》一文所述，在一些激进地区，在公共食堂无粮可吃时，干部仍禁止农民采集野菜充饥；即使允许采集野菜，也要求上交食堂。在粮食收获之后，口粮供应稍微宽松之际，地方干部即在上级部门的压力下强令恢复食堂。²²兴建公共食堂的本意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在无粮可吃情况下允许食堂名存实亡，实际上是人民公社推卸提供口粮的责任；在粮食收获后再次强制恢复食堂，食堂浪费及干部多吃多占又提前耗掉了农民本可维持到下个收获季节的口粮。因此，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陷入了“缺粮解散-有粮恢复-加剧缺粮”的恶性循环。

《退堂权》一文以地区年底猪存栏数变化衡量该地区公共食堂制度的激进程度。杨涛（2010）认为，当饥饿夺走农民生命时，屠宰牲畜充饥是必然现象，因此猪的存栏数与地方死亡率存在负相关，但不是来源于刮共产风宰杀吃掉家畜的途径。范子英（2010）则提出公共食堂这一变量存在严重内生性，即有一些因素（如大规模耗用劳动力参加水利工程）影响到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死亡率；用猪存栏数来代理公共食堂，其包含的噪音比公共食堂本身还多。

以猪存栏数作为公共食堂代理变量，有其合理性。影响猪存栏数的因素有三：家畜流行病状况、饲料粮数量及家畜饲养模式。第一，在大饥荒时期，未发现人和牲畜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记录（人浮肿病除外，实质是因营养不

¹⁹ 文贯中和刘愿（2010）。

²⁰ 罗平汉（2001，第36页）。

²¹ 胡代光（1958）根据北京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总结了对待公共食堂的三种态度：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积极拥护赞成；富裕中农，以及有格外收入的家庭，懒汉表示反对；另外1/3的人采取观望态度，盘算着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时则愿意加入，否则不来。

²² 即使在饥荒较轻的江西省，公共食堂制度的强制性仍得到普遍执行。在丰城县小岗公社张家洲村，1961年春节发给各户半个月的粮食分户吃饭，春节后农民都不愿吃食堂了，纷纷要求继续分户开伙。结果，生产队长被公社、大队干部批评了一通，大队干部李公华说：“不办食堂就不发口粮。”最后，社员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又回到食堂吃饭。（龙宇文，1988。转引自黄道霞主编，1992：第585页。）

良所致),因此因素一可视为不变。第二,虽然我们的计量模型未给出饲料粮的数量,但已控制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这可作为饲料粮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大饥荒时期,饲料粮在农村留粮中所占比重是稳定的(至少不会下降),即农村留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饲料粮的变动。第三,大饥荒时期猪存栏数大幅度下降,饲养模式由家庭饲养转变成公共食堂饲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共食堂初期,共产风迫使农民不得不提前宰杀生猪过量消费;公共食堂办集体养猪场,生猪由私产变成公产,即使公共食堂指定专人负责亦因照料不周而加剧死亡。²³在公共食堂解散后,自留地及家庭副业恢复,生猪恢复家庭养殖,导致存栏数增加。

在饥荒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农民因饥饿难忍而杀猪充饥,但这种现象在“大跃进”饥荒时期并不普遍。在公共食堂制度下,生猪作为集体财产受到的保护更甚于农民的生命。在信阳事件中,遂平县嵯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因偷吃死猪受到吊打游街最后死亡的惩罚;韩楼大队一个老农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被发现后被逼游街吊打最终惨死。²⁴类似案例普遍发生在大饥荒时期。因此,农民宰杀生猪主要发生在公共食堂建立初期共产风兴起之时,在饥荒加剧及后期,包括猪在内的家畜家禽的生存权甚至优先于农民的吃饭权。

官方文件证实了公共食堂制度导致猪存栏数减少。1959年6月30日,吉林省委发布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²⁵在庐山会议上,周小舟也认为食堂不利于养猪。²⁶1961年4月胡乔木在湖南韶山公社调研后指出食堂的弊病之一是“不利于养猪等家庭副业”。²⁷《退堂权》一文的实证模型同时考虑了地区粮食生产、粮食净征购、重工业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他激进政策因素,以猪存栏数的变动较准确地反映了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的作用。²⁸

三、饥荒结束

“大跃进”饥荒在粮食增产背景下爆发,同样令人疑惑的是,饥荒却是在

²³ 例如,1958年秋起安徽省农村公共食堂大办养猪场,其中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5个公社建立15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杨继绳,2008,第279—281页)。

²⁴ 杨继绳(2008,第55页、56页)。

²⁵ 杨继绳(2008,第322—323页)。

²⁶ 杨继绳(2008,第671页)。

²⁷ 见《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年。

²⁸ 关于“大跃进”饥荒成因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参见刘愿《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一文的论述。

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最低值时结束的。²⁹ 范子英等（2008）提出“大跃进”饥荒的达尔文效应是饥荒结束的原因：饥荒淘汰掉能力最弱的群体，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因而较易走出饥荒。他们的 Probit 模型发现各省 1964 年人口普查时年龄在 14—43 岁人口的比例（Yong）、饥荒年份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CEDR）对于饥荒结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未发现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结束的显著作用。范子英（2010）进一步指出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结束饥荒的作用。

实际上，《退堂权》一文所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包括三层含义：口粮强制集体化、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因为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出对口粮的数量和质量有极大的调节作用，因而为了控制口粮，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存废就必然与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成败密切相关，而解散公共食堂则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恢复。这三位一体的制度的废除对于饥荒竟在农村粮食消费量降至最低水平的情况下突然结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强制性食堂的解散必然提高粮食的消费效率，而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合法化必然提供及时的食物补充。范子英提出的大饥荒的达尔文效应假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累计死亡率最高，但饥荒却结束得最晚。³⁰ 因此，饥荒结束的达尔文效应假说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大跃进”饥荒存在达尔文效应，剩余的人口不仅要比那些死亡的人口抵御能力更强，而且在口粮下降的情况下，要比自身在饥荒前的状况更优，并至少应反映在粮食生产的增加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回升上。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饥荒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农村，那些剩下的人口基本上是在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下挣扎幸存下来的，其身体素质可能好于那些死亡的人口，但绝不可能优于自身饥荒前的状况。事实是，除了高级干部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获得特需供应之外，普通城市居民在饥荒年代也因口粮不足、营养不良而身体素质下降，³¹ 普通农民在饥荒后期身体状况之糟糕可想而知，饥荒对幸存者身体状况的破坏影响深远。³² 因此，饥荒的结束并非幸存者身体更强壮所致。

其次，范子英等（2008）以 45 岁作为分界线划分老年人和青壮年，根据 1953 年、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饥荒的达尔文效应。实际上，这种粗略的划分未能准确反映饥荒对不同年龄人口影响的相对大小。如

²⁹ 见文贯中和刘愿（2010）。

³⁰ 四川省 1958—1961 年累计非正常死亡率高达 113.5%，比排第二位的贵州省的 59.1% 高出近一倍。在其他地区 1962 年死亡率已低于饥荒前的水平时，四川省 1962 年非正常死亡率仍然高达 4.1%，饥荒结束得最晚。（Chang and Wen, 1997, p. 24.）

³¹ 例如，崔柏森 1961 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工程师，因口粮不足几次差点晕倒，夫妻俩都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杨继绳，2008，第 563 页）。

³² Chen and Zhou (2007) 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个体数据研究发现，“大跃进”饥荒对幸存者产生了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后果。Almond *et al.* (2007)、Xin and Qian (2009)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图4所示,人口学家常用人口年龄结构图反映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如果人口寿命无异常变动维持平稳状态,两次普查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应该是对称的。图4显示青壮年和婴幼儿两个年龄段人口在饥荒时期遭受严重损失,儿童期人口幸存比例增加。图5准确刻画了两次人口普查时各年龄段人口比例的变化。如图5所示,饥荒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导致0—1岁人口比例骤升。饥荒时期人口生育能力下降导致婴儿延迟出生及幼儿营养不足而夭折,2—5岁人口比例显著下降。6—17岁人口比例的二普数比一普数大幅度增加。18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的二普数均小于一普数,³³其中,18—25岁人口比例降幅最大。考虑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离饥荒的爆发及结束间隔了3—5年,因此,“大跃进”饥荒中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13—22岁,幸存人口主要集中在1—12岁,范子英强调的饥荒后人口结构优化并不显著。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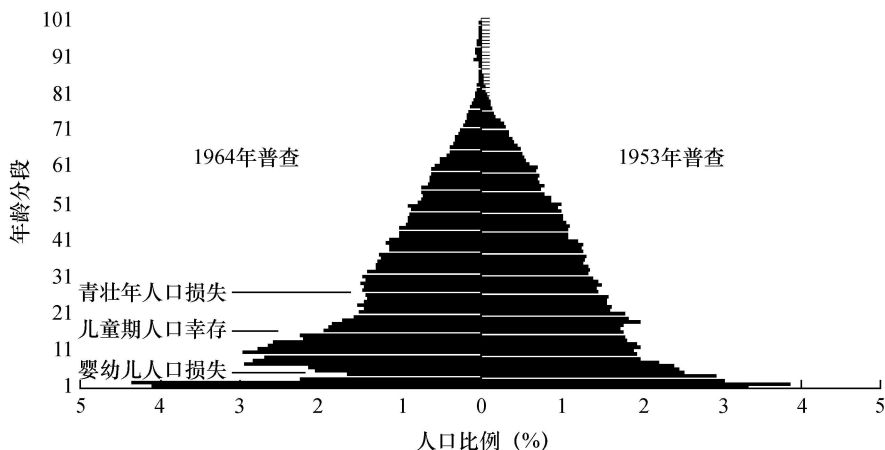


图4 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金字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1988,第478—481、602—605页)。

最后,范子英等(2008)的实证模型结果并不能证明“大跃进”饥荒存在达尔文效应。饥荒结束的真正原因是,累计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在饥荒后期政策转向(尤其是公共食堂制度)更加迅速和彻底。《退堂权》一文在分析饥荒结束的原因时比较了安徽和四川的情况。四川和安徽的累计死亡率位列全国各地之首,³⁵按照达尔文效应理论,四川应该最早结束饥荒。但事实上,

³³ 例外情况是,26—27岁、30—31岁人口比例二普数略高于一普数。

³⁴ 范子英等(2008)之所以得出小于45岁人口比例二普数略高于一普数,原因是6—17岁人口比例增加的幅度远超过18—45岁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从而产生了饥荒使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假象。饥荒这种对不同年龄人口影响的机制是:对于那些1—12岁的人口而言,其维持生存所需的日热量摄入量较低,而且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使家庭可能将异常紧缺的口粮留给子女。13—22岁人口之所以在饥荒中不容易存活,原因可能是这一年龄段人口维持生存所需的日热量摄入量较高,而且还可能从事高强度的劳动。

³⁵ 四川累计非正常死亡率为113.5%,为各地区首位;安徽累计非正常死亡率为58.9%,仅次于贵州的59.1%,位列第三(Chang and Wen, 1997, p.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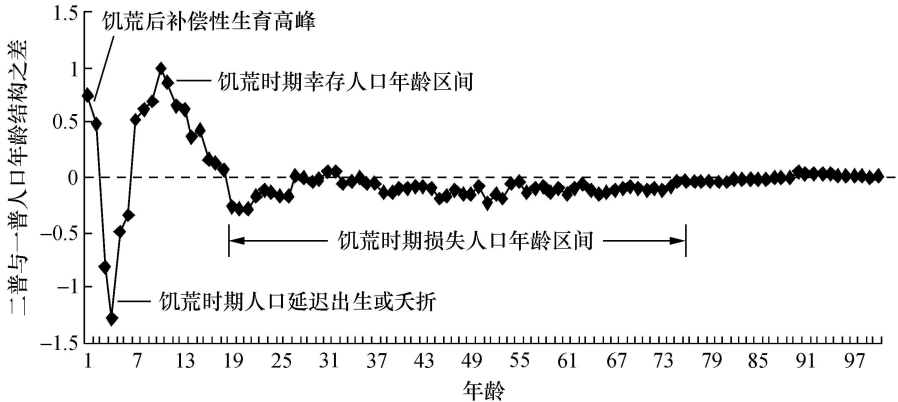


图5 1953年、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分年龄人口比例之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1988，第478—481、602—605页）。

四川的饥荒发生得最早（1958年秋冬起），却结束得最晚（1962年仍有饥荒发生）。³⁶因此，达尔文效应理论无法解释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的情况。安徽省在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率达到56.9%的最高值后，1961年迅速结束了饥荒，³⁷但原因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是安徽省政策在1961年转变得非常迅速和彻底，包括提前解散公共食堂及随之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甚至推广了包产到户的耕作模式。可见，除了四川省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外，其他地区因为遭受饥荒，在中央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形下必然会改变政策，累计死亡率越高的地区，政策转向越迅速越彻底，饥荒结束越快。

概言之，饥荒结束的真正原因，不是累计死亡率所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而是在中央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累计死亡率过高所引起的以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为主的政策转向。

四、总结：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

在肯定“大跃进”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退堂权》一文突出强调了三位一体的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在饥荒爆发、加剧和结束中的关键性作用，这可看做是对杨涛提出的集权、计划严重失误及政治行为是大饥荒的三大成因的向前推进和具体化。中国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激进主义政策和集权加剧的过程。但在种种政治激进主义政策中，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激进，只要没有强制性公共食堂作为这种激进主义的主

³⁶ 在其他各地区饥荒均已结束之际，1962年四川非正常死亡率仍然高达4.1%（Chang and Wen, 1997, p. 24）。

³⁷ 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率为-3.5%，表明安徽省在该年即迅速结束了饥荒（Chang and Wen, 1997, p. 24）。

要内容,饥荒就没有发生。公共食堂将集权体制发挥到极致,农民因此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吃饭权。这在饥荒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中国“大跃进”饥荒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口损失的根本原因。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实质是,国家和集体为实现赶超目标剥夺了农民个体的自由选择权,致使农民陷入一种制度绝境;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在于,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安排口粮和来自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副食品,排除了国家和集体对家庭消费的非正义的剥夺。

饥荒,是人类社会中人际间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部分人可能在粮食产量未显著减少甚至粮食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因“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³⁸而死亡。因此,避免饥荒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更为重要的是要赋予所有个体平等的自由选择权。这或许是上至洛克、休谟、斯密,下至哈耶克、森等一系列政治哲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阐述自由之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阿马蒂亚·森(1981),《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 [2] Bern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377.
- [3]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第1期,第14—28页。
- [4] Chang, G., and G.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 [5] Dalrymple, 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4”, *Soviet Studies*, 1964, 15(3), 250—284.
- [6] 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谨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
- [7]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第8期,第104—113页。
- [8]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07第6卷第2期,第487—512页。
- [9]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经济学(季刊)》,2008第8卷第1期,第287—306页。
- [10] 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3期,第1151—1162页。
- [11]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1983)》,1983年11月。
- [12]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年5月。
- [13] 哈耶克(1940),“社会主义的计算(三):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 [14] Haggard, S., “Let Them Eat Juche”, *The Economist*, May 8th, 2008.

³⁸ 阿马蒂亚·森(2001,第55页)。

- [15] 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 [16]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 [17] 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6, 4(1), 53—71.
- [18] 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7, 4(2), 123—142.
- [19] Lin, J., and D.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9(460), 136—158.
- [20]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 [21] 绵阳地区农业局,《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资料汇编(1961—1975)》,1976年10月。
- [22] O'Grada, C., "Making Famine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1), 3—36.
- [23] Ó Gráda, C., *Famine: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4] Ravallion, M.,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3), 1205—1242.
- [25] Rieff, D., "The End of Hunger?"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30, 2009.
- [26] 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 [27] 新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 [28] 薛暮桥(1959年6月),“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载《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29]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visit the Effect of Free Exit from Communal Dining Halls on the Great Leap Famine

GUANZHONG JAMES WE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Yang and Fan's comments, we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y following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famine's start, exacerbation and end: Whether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1958 and energy-consuming activities triggered the famine? How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olidation of the communal Dining halls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Lushan Summit made the famine first lessened and then worsened? How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the communal Dining halls? Was the Darwinian Effect or the policy change that actually ended the famine? We argue that it is advisabl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in human societies such as famines by giving individuals freedom of choice.

JEL Classification N55, O18, Q18